

全球智库半月谈

金融危机后的全球银行业

后朴槿惠时代韩国面临的经济挑战

未来十年美国的经济增长预测

特朗普的预算削减案是公平且必要的

人民币国际化：中美治国方略的竞赛

亚洲之行：马蒂斯的使命

本期编译

安婧宜

侯书漪

郭子睿

刘立群

李笑然

史明睿

申劭婧

谢晨月

伊林甸甸

杨 茜

章珏

(按姓氏拼音排序)

中国社会科学院陆家嘴研究基地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 国际战略研究组

《全球智库半月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主编的中国社科智讯数据分析报告的组成内容，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和国际战略研究组为您提供。

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

主任	张宇燕		副主任	何帆
首席专家	张斌	开放宏观		
团队成员	刘仕国	欧洲经济	徐奇渊	中国经济
	吴海英	对外贸易	曹永福	美国经济
	冯维江	新兴市场	肖立晟	国际金融
	高凌云	对外贸易	熊爱宗	国际金融
	梁永邦	宏观经济	杨盼盼	国际金融
	常殊昱	国际金融	史明睿	科研助理

国际战略研究组

组长	张宇燕		副组长	何帆
召集人	徐进		协调人	彭成义
团队成员	李东燕	全球治理	袁正清	国际组织
	邵峰	国际战略	徐进	国际安全
	薛力	能源安全	欧阳向英	俄罗斯政治
	黄薇	全球治理	冯维江	国际政治经济学
	王鸣鸣	外交决策	高华	北约组织
	卢国学	亚太政治	王雷	东亚安全
	彭成义	中外关系	徐秀军	全球治理
	田慧芳	气候变化	李燕	俄罗斯政治

任 琳	全球治理	丁 工	发展中国家政治
赵 洋	科研助理	刘 畅	科研助理
周 乐	科研助理		

联系人: 史明睿 邮箱: iwepceem@163.com 电话: (86)10-8519 5775 传真: (86)10-6512 6105

通讯地址: 北京 建国门内大街 5 号 1543 邮政编码: 100732

联系人: 许怡 邮箱: naonao0619@163.com 电话: (86)21-50815287 传真: (86) 21-50815265

通讯地址: 上海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1600 号 24 楼 2409 邮政编码: 200122

免责声明:

版权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和国际战略研究组所有, 未经版权所有人许可, 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上网和刊登, 如有违反, 版权所有人保留法律追责权利。《全球智库半月谈》所编译的文章, 仅反映原文作者的观点, 不代表编者、版权所有人或所属机构的观点。

目 录

世界热点

金融危机后的全球银行业 7

导读：就规模而言，全球银行业出现分化，亚洲的银行规模持续增加，欧洲的银行业受结构性、危机以及政策等因素规模出现下滑。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加强了对 G-SIBs 的监管，G-SIBs 的资本充足率普遍出现增加。关于全球性资产的占比，亚洲国家的 G-SIBs 资产占比提升，欧美国家份额普遍下降。但这种下降只有 16% 是由于全球性业务的下降，84% 是由于该区域的银行在整体银行业的系统重要性下降导致的。亚洲国家的 G-SIBs 全球性资产占比提升也主要是由于该区域的银行在整体银行业的系统重要性大幅度提高。

来自中国的竞争削弱了美国企业的创新能力 9

导读：近年来，美国的政客们越来越关心美国制造业的衰退，不过他们的关注点大多在于制造业衰退带来的就业问题。然而，很少有人注意到，美国制造业创新水平和规模的衰退，可能在长期给美国经济带来更大、更持久的负面影响。

后朴槿惠时代韩国面临的经济挑战 13

导读：朴槿惠已经卸任韩国总统，在她任期内，韩国经济年均增长率降至 2.9%，为韩国历任总统任期内最低。即便如此，她的继任者仍面临更严峻的经济形势，韩国人口老龄化正在透支未来韩国经济增长的潜力。

清明节：美国对华政策的最后期限 16

导读：中美两国目前的不确定性给利益相关方带来深深的焦虑。习近平主席将会在 4 月的 6-7 日拜访特朗普总统，这次的会晤是解决当前不确定性的一个好时机，但特朗普总统需要明确如下五个问题。第一，如何让中美关系促进美国繁荣和安全的目标？；第二，特朗普想向习近平主席要什么？第三，美国准备做哪些妥协以和中国进行交换？第四，如果中国没有按照需求清单对话，特朗普政府该如何应对？第五，如何组织这次谈话？

未来十年美国的经济增长预测 18

导读：特朗普政府正考虑改变计算双边贸易逆差的方式。其目标是结束对美国贸易逆差的低估，从而帮助政府做出更好的贸易协定，也就是减少赤字。但经济学家们认为这一方法是错误的，存在很多缺陷。

经济政策

欧洲的未来在哪里？ 20

导读：欧盟委员会白皮书提出了五个关于欧盟未来的愿景，但却没有解决欧盟面临的基本问题。欧盟应该如何与另过相处？我们如何缓解不同国家以不同速度实现一体化带来的矛盾？最重要的是，在财政联盟没有实现的情况下，欧盟如何持续？

特朗普的预算削减案是公平且必要的 22

导读：特朗普近期发布了第一个预算，旨在削减 540 亿美元的非国防项目，减少了包括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援助、交通运输补贴、能源补贴以及对文化组织的补贴。特朗普的预算削减是公平且必须的。削减计划将在国会上受到双方政党的激烈讨论。

聚焦中国

人民币国际化：中美治国方略的竞赛 24

导读：目前，人民币对美元的威胁是清楚无疑的。中国决心在最大可能上推动其货币的全球化，尽管在政策主动性上中国完成较好，但目前对市场行为的实质性影响还很有限，主要因为北京并未采取行动，这反映了其尚处于发展阶段的金融体系和美元在全球市场上持续的独一性。然而如果美国政策仍像过去一样自满，一切都会改变。特朗普政府越推进其重商主义计划，美元越有可能在将来被人民币取代。

中国不平等程度的逆转 26

导读：自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日益严重的收入不平等现象就一直伴随着中国的发展。然而，许多研究显示，过去十年，中国收入不平等现象正渐趋稳定。本文运用住户调查、区域级政府统计数据等多个数据集，探索 21 世纪初期不平等现象的变化及其缓解的原因。城市化、转移支付和监管制度变化以及收缩的农村劳动力市场是收入不平等现象缓解的原因。

战略观察

亚洲之行：马蒂斯的使命 32

导读：本周，美国新任国防部长马蒂斯将访问日韩两国，这是其任内的首次海外访问。文章认为，马蒂斯此行主要有三个使命：第一是加强与日韩两国领导和防长的个人交流，第二是让日韩两国承担更多的自身防卫义务，第三是强调东北亚各项问题上美日韩开展双边和三边合作的重要性。而其向盟友传递的核心信息就是“美国仍与你同在，但美国希望你做的更多”。

日本外交政策的主导方向：继续与美国保持积极稳定的关系 . 34

导读：随着 1 月 20 日的到来，特朗普将真正入主白宫成为美国的执政者。日本安倍政府也在不断调整其外交政策，积极争取特朗普执政后与其进行后续会谈。2017 年 1 月 17 日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Chatham House）网站发表文章《日本外交政策的主导方向：继续与美国保持积极稳定的关系》。作者主要从美日两国在亚太地区的东海、南海领域合作的利益，

美国对韩日两国发展核武器以及日本对核武器发展的观点, TPP 被废止后日本的新选择以及未来日本在美国和亚洲地区合作中的角色等三方面进行了叙述。

随着韩总统朴槿惠正式离职, 韩国将会面对什么? 36

导读: 随着朴槿惠“闺蜜们”事件开始, 韩国国会弹劾朴槿惠总统案件持续进行, 在 2017 年 3 月 10 日朴槿惠弹劾案最终审判, 通过总统弹劾决议。针对此弹劾案与韩国未来政局发展, 对外关系委员会 (CFR) 官方网站在 10 日当天发表文章《随着韩总统朴槿惠的正式离职, 韩国将会面对什么?》。作者在本文中主要介绍了韩国保守派和进步派之间的两派系状况、有关新总统对外来外交政策发展方向和实现国内政治权力顺利过渡的相关内容分析。

本期智库介绍 38

金融危机后的全球银行业

Dirk Schoenmaker /文 郭子睿/编译

导读：就规模而言，全球银行业出现分化，亚洲的银行规模持续增加，欧洲的银行业受结构性、危机以及政策等因素规模出现下滑。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加强了对 G-SIBs 的监管，G-SIBs 的资本充足率普遍出现增加。关于全球性资产的占比，亚洲国家的 G-SIBs 资产占比提升，欧美国家份额普遍下降。但这种下降只有 16% 是由于全球性业务的下降，84% 是由于该区域的银行在整体银行业的系统重要性下降导致的。亚洲国家的 G-SIBs 全球性资产占比提升也主要是由于该区域的银行在整体银行业的系统重要性大幅度提高。编译如下：

2008 年金融危机发生时，全球大银行由于其在危机中扮演的负面角色而备受关注。危机之后，国际金融稳定论坛被升级为金融稳定委员会（FSB），旨在加强对全球系统性重要银行(G-SIBs)的监管，解决系统性风险和道德风险。时过八年，这些措施对 G-SIBs 产生了哪些影响呢？我们从三个角度来探索这一问题：第一，他们的规模是否收缩？第二，他们的资本充足率提高了吗？第三，关于全球性银行消失的报道，他们的全球业务是否降低？

我们使用五个指标来评估银行是否是全球系统性重要银行：规模，全球活动，相互联系，服务的可替代性以及复杂程度。我们的数据包括了全部的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我们采用资产规模来代替银行的规模，采用杠杆率，也即是一级资本/总资产来衡量资本充足率，采用母国资产比例或者银行在世界其它区域的银行资产比例来衡量全球业务的开展。整体来看，G-SIBs 的规模并没有萎缩，从 2007 年到 2015 年上升 5%，尽管这一比例低于全球经济增长的速度。G-SIBs 的资本充足率出现较大幅度的增加，从 3.1% 上升到 5.9%。全球性的资产比例从 2007 年的 44% 下降到 35%，但区域性的资产比例也出现同等幅度的下降。也即是说，全球性资产的下降并不是由于区域性资产比例的增加导致。

银行的规模

不同的国家区域银行业的规模发生了不同的变化。亚洲国家，如中国和日本，并没有明显收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他们的银行业规模持续增长，从 2007 年到 2015 年上升到 40%。美国的银行自 2009 年注资之后，美国银行和经济都恢复了增长。作为对比，欧洲的银行业规模在缩减，英国下降 34%，瑞士下降 45%，平均下降 19%。

欧洲银行业的下降源于三方面的因素：第一，结构性的，欧洲的融资 80% 由银行提供，目前正在从间接融资向直接融资转变；第二，受到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双重打击，欧洲当局没有及时的为银行注资；第三，政策相关。英国和瑞士为增强银行业的弹性，要求银行改革，提高资本充足率，银行不得不削减规模。

银行资本

全球银行业资本充足率普遍提升。从 2007 年到 2015 年，瑞士，英国和美国的资本充足率分别增加 3.1%，2.9% 和 2.7%。就具体水平而言，中国和美国的 G-SIBs 资本充足率目前高达 7.6% 和 6.6%，紧跟其后的是英国 5.6%。为了进一步分析资本充足率提高的原因，我们分别考察分子资本的变化以及分母资产的变化。发现，资本充足率的提高，78% 是由于资本的增加导致，这可能是实施巴塞尔协议 3 的结果，只有 22% 的提高是由于资产的变化导致。

跨境银行业

关于跨境业务方便，不同国家的银行展现不同的情景。亚洲区域的银行全球化业务明显提升，中国的银行提高 3%，日本的银行提升 8%。美国的银行跨境业务明显降低，这也可能是由于美国银行的跨境业务主要针对欧洲，而欧洲的经济一直萎靡不振。英国和瑞士的银行跨境业务分别下降 4% 和 7%，下降的业务主要在欧洲，而不是全球层面。通过进一步分析表明，全球 G-SIBs 跨境业务的下降只有 16% 是由于银行全球业务拓展的下降，84% 是由于单个银行在整体银行业的系统重要性下降导致的。

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关于全球性银行消失的报道过于夸张了。就规模而言，全球银行业出现分化，亚洲的银行规模持续增加，欧洲的银行业受结构性、危机以及政策等因素出现下滑。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加强了对 G-SIBs 的监管，G-SIBs 的资本充足率普遍出现增加。关于全球性资产的占比，亚洲国家的 G-SIBs 资产占比提升，欧美国家的普遍下降。但这种下降只有 16% 是由于全球性业务的下降，84% 是由于该区域的银行在整体银行业的系统重要性下降导致的。亚洲国家的 G-SIBs 全球性资产占比提升也主要是由于该区域的银行在整体银行业的系统重要性大幅度提高。

本文原题为“**What happened to global banking after the crisis?**”。本文作者 Dirk Schoenmaker 是 Bruegel 的高级研究员。本文于 2017 年 3 月刊于 Bruegel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来自中国的竞争削弱了美国企业的创新能力

David Autor 等 / 文 伊林甸甸 / 编译

导读：近年来，美国的政客们越来越关心美国制造业的衰退，不过他们的关注点大多在于制造业衰退带来的就业问题。然而，很少有人注意到，美国制造业创新水平和规模的衰退，可能在长期给美国经济带来更大、更持久的负面影响。全文如下：

在本届美国总统大选的历次辩论中，制造业的衰退都是双方关注的焦点。《纽约时报》的记者 Binyamin Appelbaum 就曾以此为题发问：“为何政客们都如此痴迷于制造业话题？”这种悲观情绪的背后，是美国制造业的严峻现实：自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制造业总的工作岗位仅有 1250 万左右，这是 1941 年以来的历史最低水平。进入 21 世纪后，美国制造业岗位流失了超过 600 万，而更令人震惊的是，大部分工作的流失早在金融危机前就已经发生了。

尽管自 2000 年以来美国的制造业就业持续低迷，但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却保持着与 GDP 增速相同的速度增长。同时，制造业占美国整体经济规模的比例在最近十几年来也保持稳定，与其他发达经济体相比，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Moran and Oldenski, 2014）。有人可能会说制造业的增长当中有一大部分是由表现良好的半导体和计算机业所带来的，但从整体来看，美国的制造业规模增长势头明显超过了其带来的就业增长速度。

另一个表征制造业健康程度的指标，是以专利数衡量的制造业创新程度。无论实验室开发出了哪些新技术新工艺，这些技术进步的大部分最终都会被应用到制造业的工业生产当中。美国制造业投入的研发费用占到全美的三分之二，其专利数量也保持着差不多大的规模。我们从图 1 可见，总部在美国的企业每年申请的专利数量从 1991 的每年 40000 个增长到了 2001 年的每年 80000 个，随后逐年走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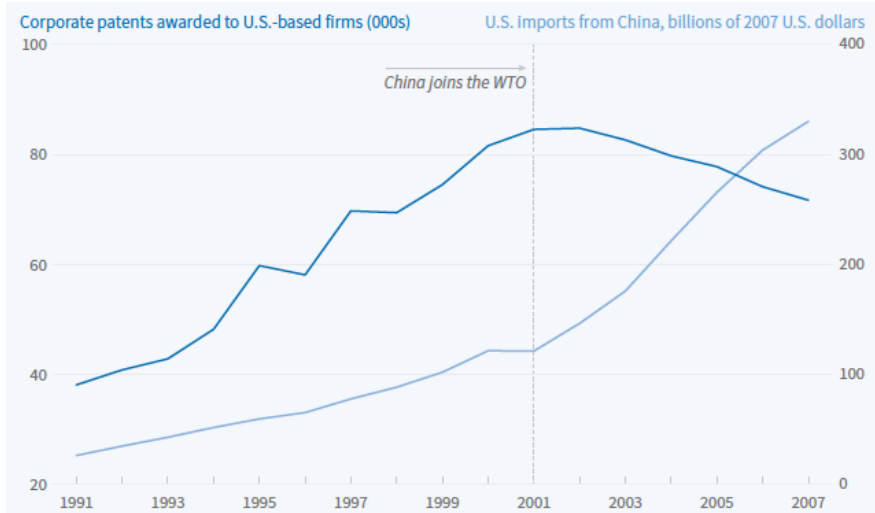


图 1 美国的创新活动与中国的进口冲击

自 90 年代至今，全美的制造业都暴露在来自中国的进口冲击之下。图 1 表明，中国的对美出口从 1991 年到 2007 年间增长了 10 倍，而这些增量中大部分发生在 2001 年之后，这与美国企业专利申请数在 2001 年后逐年下降的趋势在时间上是吻合的。中国出口量的激增是由以其加入 WTO 为标志的一系列贸易自由政策带来的，中国迅速成长为世界领先的出口国，对于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大经济体都带来的显著的冲击（Autor 等，2016）。

许多文献都从不同方面研究了中国的出口增长对美国国内劳动力市场带来的冲击，比如从制造业雇佣规模的方面(Pierce and Schott, 2015; Acemoglu 等, 2016)，或是从工人工资的方面(Autor 等, 2014)。但关于中国出口增长对美国企业创新的冲击，学术界还少有研究。从理论上来说，产品市场的激烈竞争对企业创新活动的作用机制还比较模糊。在标准的寡头竞争模型中，更激烈的产品市场竞争将会降低企业利润，并且进一步降低企业对研发的投入。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更激烈的竞争也可能诱发企业具有更强的研发动机，这可能是因为在具备更高的技术水平后受到的成本约束更小（Agion 等，2005）；也可能是因为企业可以通过创新来增加生产环节的效率（Bloom 等，2014）。从实证的角度来看，有学者研究欧洲数据并发现，不少欧洲国家都在来自中国的进口量增加后加大了研发投入，尽管其同一时间的就业持续衰退（Bloom 等，2016）

我们在最近的一篇研究中分析了来自中国的进口冲击对美国制造业创新的影响（Autor 等，2016）我们收集了 1975 年到 2007 年间所有美国企业申请、且在 2013 年 3 月前获得批准的专利数据。此外，我们还将这些专利的申请公司对应到了标普的电子计算机会计数据库中注册的企业（Compustat Database）。这

个对应过程的一个难点在于，专利申请数据中的公司名称往往存在各种各样的错误（比如使用了不同版本的名称缩写、不同时代的公司名称、或者错误地拼写了公司名称），这使得专利数据中的企业名与标普数据的企业名并不一定能一一对应。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开发了一种新的企业名称对应算法。这个算法的原理是这样的：首先，我们把出现在专利数据库或者标普数据库中的企业名称输入必应搜索引擎（bing.com），并且记录出现的前五条结果的网址（URL）信息。然后，如果使用专利数据库中的企业进行搜索得到的两条或以上的网址，与使用标普数据中的企业得到的完全相同，我们就认为这两个名称对应的企业就是一家企业。这种算法的精妙之处在于，它充分利用了互联网搜索引擎的检索能力，而且它是一种全自动的搜索方法。我们使用这种方法将专利数据库中 75% 以上的企业对应到了标普数据库，并且成功覆盖了所有在美国上市的企业。

值得注意的是，图 1 并没有体现出美国制造业专利申请在细分行业上的异质性特征。电子产品制造业在美国制造业规模中的比重从 1975 年的 10% 下降到了 2007 年的 35%，但却贡献了 90 年代美国专利申请增速的绝大部分。与之相对应的是，化工业占比从 70 年代的 27% 下降到了 2007 年的 10%，而化工业申请的专利数也相应下降。这两个行业规模和专利申请的变化都早于来自中国的进口冲击，因此我们不能将电子产品制造业不断增长的专利申请数归结于来自中国的更加激烈的进口竞争，因为电子产品制造业早在这之前就一直在高速增长。

我们的核心结论是，那些受到更多的来自中国的进口冲击的行业，其专利申请数也会显著下降，具体的讲，某个行业受到来自中国的进口冲击上升一个标准差，就会降低其专业申请数量的 15%。同时我们也发现，在中国的进口冲击到来之前，制造业中的各个细分行业并没有显著的专利申请下降的趋势。

通过与企业数据的结合，我们可以结合企业自身经营的数据进行研究。我们发现，来自中国的进口竞争不仅削弱了美国企业的专利申请数量，更使得企业降低了其研发投入，同时也进一步使之在销售额、员工数和市值等方面遭受损失。

我们同时也发现，美国企业并非只是把研发部门转移到了海外：那些受到中国冲击的企业，其国内雇员和海外部门的专利申请数双双下降。这意味着，由于受到中国的进口冲击，美国企业的利润和盈利能力不断下降，这逼迫它们在多个领域削减开支，其中就包括了研发部门。与之相吻合的是，在专利申请方面受到冲击更大的企业，往往是原先就负债累累，盈利能力差的企业。

总的来说，我们通过研究发现，企业的经营状况、盈利能力和其研发投入更多呈现互补品的关系，而非替代品。也就是说，在遭遇更激烈的市场竞争时，企

业往往会选择削减研发开支，而非相反地加大研发投入。美国的政客们固然非常关心制造业的衰退，但他们的关注点大多在于制造业带来的就业问题。而美国制造业创新水平和规模的衰退，则可能在长期给美国经济带来更持久的负面影响。

本文原题为“Competition from China reduced innovation in the US”。本文作者 David Autor 为美国麻省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 David Dorn 为瑞士苏黎世大学大学经济学教授, Gordon Hanson 为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经济学教授, Gary P. Pisano 为美国麻省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 Pian Shu 为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 本文于 2017 年 3 月刊于 VOX 官网。
[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后朴槿惠时代韩国面临的经济挑战

Evan Ramstad / 文 史明睿 / 编译

导读：朴槿惠已经卸任韩国总统，在她任期内，韩国经济年均增长率降至 2.9%，为韩国历任总统任期内最低。即便如此，她的继任者仍面临更严峻的经济形势，韩国人口老龄化正在透支未来韩国经济增长的潜力。编译如下：

既然朴槿惠已经下台，就可以来评价一下她任期内的韩国经济表现了。从 2013 年朴槿惠担任韩国总理的前八周，到 2016 年朴槿惠历任的前十周，韩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为 2.9%，为韩国历任总理中最低。

她不关心韩国面临的经济挑战，极少提及这些问题，无法针对这些经济问题提出创建性的解决办法。对于韩国人面临的经济困难，她几乎没有表示任何的理解或同情。假使朴槿惠先前愿意花更多时间努力提振韩国经济，那么在她遭受“闺蜜干政”丑闻打击时，将得到更多的公众支持。这些支持尽管不足以拯救朴槿惠，但仍可以为她处理危机提供缓冲的余地。

朴槿惠的继任者面临的问题是，他很难使韩国经济变得比朴槿惠当政时期更好。短期内好像还有经济好转的机会，例如，韩国二月份出口贸易增长了 20%，与去年相比有明显转机，但长期来看，正如朝鲜核问题正变得越来越棘手，重塑国家经济将变得更加困难。朴槿惠浪费了调整的关键时期。例如，人口老龄化问题的蔓延，正使韩国备受煎熬但政客们仍然停留在关于公平和增长的过时辩论中。

十年前，在 2008 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之前，韩国民众因 2003 年初至 2008 年初卢武铉总统任期内经济增速低于 5% 而沮丧。从那时开始，韩国进入增长率下降的模式，这也是韩国财富日益增长的自然结果。随着国家变得越来越富裕，大量法律出台反对维持过去的增速。全斗焕任期内年均增长率为 7.4%，其次是其继任者金大中的年均增长 5.1%，金大中任期内曾发生 1998 - 1999 年韩国经济衰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定为经济危机）。卢武铉时期韩国的年均增长率为 4.5%，之后的李明博任期内，多国出现经济衰退情况，韩国经济的年均增长率维持在 3.2%。

朴槿惠不曾面对金大中和李明博时期面临的极端经济挑战，但她任期内韩国主要人口变化所带来压力正在缓慢上升。2016 年韩国的工作人口数量达到顶峰，随之开始下降，只有出生率升高或引入更多移民才能扭转这种情况，但这几乎不可能发生。在朴槿惠弹劾案涉及三星集团之前，韩国媒体上个月报道：2016 年

韩国新出生的婴儿总数创 1983 年以来最低纪录，死亡人数却处于历史最高点。据韩国国家统计局预计，2017 年韩国 65 岁以上人口将超过 14 岁以下人口。

国家需要工作中的工人来支撑退休人群，但韩国工人人数下降已难以满足社会保障需求。韩国日报的商业专栏近期援引了韩国一位副执行董事的观察，专栏指出，缺少年轻人投身于科研创新事业，韩国的创新发展正面临风险。例如，芯片产业会议上的日本工程师多为六十多岁，中国工程师多为二、三十岁，韩国工程师年龄介于上述两国之间。“虽然韩国可以领先一段时间，但创新并不容易”，该董事对专栏作家说。

在人口老龄化方面，韩国很可能步日本后尘，甚至超过日本。韩国妇女的生育率低于日本的妇女，而且韩国的移民政策与日本一样存在限制。根据 2015 年的数据，65 岁以上的韩国人中贫困人口占到一半以上，这一数字是日本的两倍，在所有发达国家中处在最高水平。经合组织指责其“养老金制度尚未完全成熟”。

日本十多年来一直在努力解决劳动人口的下降，即便如此，日本仍处于超低增长和高额国债的压力之中。日本经验的吸引力对韩国政策制定者和企业创新者都在下降。日本人不愿意鼓励生育、欢迎移民，因此，他们正寻求其他解决方案。例如，通过诸如机器人辅助等新技术，使老年男子在工厂和其他工作场所工作更长时间。日本经验的核心似乎是：无论经济成本如何，都应坚持文化传统。与此同时，很多人都指出，长期以来受益于货物和人口自由流动的美国和欧洲，也正在变得更加孤立和束缚。

最新民调显示，韩国总统竞选正由两位来自民主党的候选人领跑，而民主党自 2008 年卢武铉任期结束后，无人担任总统。几十年来，民主党的经济政策始终围绕着社会公平，关于增长和公平的争论掩盖了将发展中国家变成发达国家的复杂性，并且这对处理过去十年韩国经济结构性问题毫无帮助。但是，从现有的两位候选人来看，一种更为中间主义的经济主张正在形成。两人都在谈论增长失速及其影响，避免提及李明博和朴槿惠在 2007 年和 2012 年带来的经济过度增长。

在去年秋天朴槿惠爆发丑闻之前，2012 年选举中落后于朴槿惠的文在寅（曾任卢武铉助手）表示自由党应该更加重视经济增长。星期一，正式竞选的第一天，文在寅承诺创造 130 万个就业机会，提高就业率 3%。他的首席顾问之一，西江大学经济学家 Cho Yoon-je，对于风靡全球的保护主义情绪进行了批评，并指出了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世界的经济地图将回到之前的时代——18 世纪”。Cho 也一直批评韩国工人的生产力低下并主张取消“不相关工作”。

另外，第二领先的候选人忠清南道省长安赫荣也谈到了农民种植作物多样化的必要性，他认为，这是应对市场压力的迫切需求，而民主党之前的消极态度是错误的。与朴槿惠一样，安焕荣也主张提高的劳动灵活性。朴槿惠曾主张允许韩国雇主更容易雇用和开除员工，最后遭遇工会反对，被国会否决，不能确定安焕荣会不会对朴槿惠的主张进行大幅修改。

韩国之外，在接下来的两个月内，有关韩国总统竞选的大部分讨论将集中在候选人对朝鲜核威胁的态度以及对平衡“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目标冲突性的看法。韩国民众很可能会同样重视上述两点，但也许，民众会更关注总统候选人将如何促进经济发展。

本文原题为“South Korea's Economic Challenges After the Park Geun-hye Era”。本文作者 Evan Ramstad。Evan Ramstad 为韩国高级助理（非居民），曾任韩国经济与商业领域的首席分析师之一。本文于 2017 年 3 月刊于 CSIS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清明节：美国对华政策的最后期限

Scott Kennedy /文 谢晨月/编译

导读：中美两国目前的不确定性给利益相关方带来深深的焦虑。习近平主席将会在 4 月的 6-7 日拜访特朗普总统，这次的会晤是解决当前不确定性的一个好时机，但特朗普总统需要明确如下五个问题。第一，如何让中美关系促进美国繁荣和安全的目标？第二，特朗普想向习近平主席要什么？第三，美国准备做哪些妥协以和中国进行交换？第四，如果中国没有按照需求清单对话，特朗普政府该如何应对？第五，如何组织这次谈话？编译如下：

如果报道属实，中国的习近平主席将会在 4 月的 6-7 日拜访特朗普总统，美国还有三周的时间用来思考对华的政策。事实上，这个最后的期限就是中国的清明节。特朗普总统需要做出决定是像尼克松以来其它总统那样还是自己设定一套新的对抗方案。

特朗普总统已经提出一些不同的主张，称中国是汇率操纵国，修改“一个中国”政策，批评中国在南海和朝鲜的行为。但这里的抱怨和威胁并没有形成一个政策，或者并不能成为领导人之间为期两天会议的主题。

中美两国关系的不确定性会给每一个利益相关方带来焦虑。中国政府明白，如果中美发生贸易战，美国关税提升 45%，会拖累中国经济增速 1%，而此时中国经济正处于增速下滑期和结构转型的深水区。与中国做生意的美国公司迫切希望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但特朗普的行为可能让他们感到绝望。政府的内部也存在很大的分歧，当前的混乱已经成为美国研究和执行一致对华政策的障碍。与习近平主席的会晤刚好是一个理清思路，提出清晰愿景的机会。为解决这一不确定性，特朗普总统需要回答如下五个问题。

第一，如何让中美关系促进美国繁荣和安全的目标？自 1979 年尼克松之后，每一位总统都认为只要中国的发展在当前的国际体系之内，中国的和平崛起和繁荣有助于世界和美国的发展。美国的政策挑战不是限制中国崛起，而是塑造其发展的轨迹。当前中国提出“新型大国关系”，这意味着美国不能挑战中国的核心利益，给中国在亚太更大的自由权以及与中国一起合作解决全球问题。这要求中美是平等合作的，这确实会给美国压力，特朗普总统需要小心翼翼的处理。

第二，特朗普想向习近平主席要什么？每一个人都知道特朗普的抱怨和威胁，但中国当局并不清楚特朗普到底想让中国政府如何解决他的担忧。以经济问题为例，特朗普抱怨中国是汇率操纵国，但他又不清楚是否可以接受人民币的自由浮动，因为这会导致人民币的贬值，让中国的出口更有竞争力。

第三,美国准备做哪些妥协以和中国进行交换?特朗普可以像习近平主席一样列出一系列的“请求”。特朗普政府需要决定如何应对中国的一系列要求,如双边投资条约,市场经济地位,减少美国对先进技术出口的限制,同意与朝鲜对话,并抑制美国在中国附近地区的军事活动。

第四,如果中国没有按照需求清单对话,特朗普政府该如何应对?可以肯定的是,中国不会迅速的解决其核心问题。中国会先采取一些措施,比如让人民币升值,进口美国的页岩油,与东南亚国家会晤,真正的解决这些问题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美国政府需要决定愿意等多久,一旦耐心没了,会采取哪些措施,如全面提高关税,限制中国对美国的投资。最难决定的是,在短期内美国愿意做出多大的牺牲以实现长期的发展。

第五,如何组织这次谈话?特朗普当局需要决定与习近平的对话是基于官方的会晤还是更加强调私人层面领导之间的谈话。一方面,战略与经济对话和商贸联合委员会尽量减少官僚主义问题;另一方面,他们也变得如此之大,经常包括一些司空见惯的问题。如果美国继续降低战略与经济对话以及商贸联合委员的深度,那么白宫不得不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处理这些问题。

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在清明节将携手共同放风筝,这是一项很著名的活动。在某种层度上,中美关系也就像空中的风筝。不管是在谈判屋内还是之外,这都需要特朗普和习近平发挥足够的智慧保持两国关系悬浮在空中又要免受暴风的袭击。

本文原题为“Tomb Sweeping Day: Deadline for a U.S. China Policy”。本文作者 Scott Kennedy 是 CSIS 中国商业和政治经济研究项目的主任。本文于 2017 年 3 月刊于 CSIS 官网。
[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未来十年美国的经济增长预测

Jason Furman/文 侯书漪/编译

导读：未来十年，美国经济将以每年约 2% 的速度增长。虽然这一预测相对于 1950 至 2000 年间 3.5% 的年平均增长率来说似乎有所降低，但事实上，近几年如果没有因失业率下降带来的周期性刺激，美国想要达到 2% 的年增长率，还需要更快的生产率增长和稳定的劳动参与率。编译如下：

未来十年，美国经济将以每年约 2% 的速度增长。这一预测主要是基于两个人口统计的事实：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进入退休年龄，以及妇女涌入劳动力市场的终结。虽然这一预测相对于 1950 至 2000 年间 3.5% 的年平均增长率来说似乎有所降低，但还尚未反映出一些新的悲观主义。事实上，近几年如果没有因失业率下降带来的周期性刺激，美国想要达到 2% 的年增长率，还需要更快的生产率增长和稳定的劳动参与率。

我在 Vox 上面写的一篇文章探索了由于政策或运气的因素，对经济增长率的核心预测可能产生的变动。这种不确定性来源于，关于生产率增长和劳动力参与率的不同假设将如何影响对经济增长的预测，具体如下表所示。该文章也显示了为何政策可能会对经济增长带来一些影响，但却改变不了大体的情况。

表 1 潜在的实际 GDP 增长情况，2016-2026 年

Alternative potential real GDP growth scenarios, 2016-26			
Productivity scenario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rate scenario		
	Pessimistic (-0.3 p.p. per year)	Base case (-0.2 p.p. per year)	Optimistic (-0.1 p.p. per year)
Pessimistic (1.4 percent per year, 10th percentile)	1.4	1.5	1.7
Base Case (1.7 percent per year, CBO projection)	1.7	1.8	2.0
Optimistic (2.8 percent per year, 90th percentile)	2.8	3.0	3.2

CBO = 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p.p. = percentage point

Source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CBO; author's calculations.

这篇文章为如何计算美国未来十年的经济增长提供了额外的细节方法。它聚焦于一个基本案例，这个案例符合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对 2016-2026 的年增长率的预测的基本案例，同样的方法也适用于表中所示的其他情况。

这一分析从以下两个主要变量来计算出真实的潜在 GDP 增长：劳动参与率的年百分比变化和劳动生产率的年增长率。虽然这二者是预测潜在经济增长的两个最重要的变量，但并非唯一的变量。本文更详细地解释了在这个计算公式中其他的影响因素。

年经济增长率为 1.8% 的模型的简单版本如下，这大致接近 CBO 的假设：

劳动投入

人口（主要指 16 岁及以上）预计将以每年 0.8% 的速度增长。而实际上，劳动力参与率每年下降 0.2 个百分点，这就使得劳动力的年增长率需要在人口增速的基础上减去 0.4%。此外，假设平均每周工作时长没什么变化，就可以得出每年 0.5% 的劳动投入增长（ $0.8 - 0.4 + 0.0$ ，加上计算误差）。

劳动生产率

我在 Vox 的文章中所说的“生产率增长”是指非农商业部门的真实生产率的增长，其在历史上超过了以同样方法度量的其他经济部门（尤其是政府）的真实生产率增长。基于非农商业部门和其他部门之间的生产率增长的历史差异，假定非农商业部门有 1.7% 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而转换到整个经济就只能达到 1.3% 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

产出增长

将劳动投入 0.5% 的增长率与劳动生产率 1.3% 的增长率相加，就可以得到每年 1.8% 的潜在产出增长率。

本文原题为“Why US Growth of 2 Percent Is Plausible—And Unlikely to Get Much Higher”。本文是作者是 Jason Furman，他 2017 年 1 月成为 PIIE 的高级研究员，过去八年中担任奥巴马总统的最高经济顾问。本文于 2017 年 3 月刊于 PIIE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欧洲的未来在哪里？

Guntram B. Wolff / 文 安婧宜 / 编译

导读：欧盟委员会白皮书提出了五个关于欧盟未来的愿景，但却没有解决欧盟面临的基本问题。欧盟应该如何与另过相处？我们如何缓解不同国家以不同速度实现一体化带来的矛盾？最重要的是，在财政联盟没有实现的情况下，欧盟如何持续？全文如下：

欧洲的未来在哪里？十年后欧洲将会是什么样子？在意大利首都举行的《罗马条约》六十周年纪念日，这是许多人提出的核心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认为是和平计划的一体化似乎已经失去了动力，毕竟近年来这片大陆大体上还是和平繁荣的。

在最近的《欧洲未来白皮书》中，欧盟委员会提出了未来的五种方案。布鲁塞尔官僚提出的选择有效但平淡无奇。建议范围从保持现状，到建立一个以不同速度实现一体化的欧洲，再到“更加高效地做得更少”和在极端情况下的“做得更多”。但白皮书很少展示为什么某些情况是可能的而其它情况则不可能。它也没有探索一些情况的所面临的深层社会限制。而同样重要的是，它也没有提出欧洲机构本身需要改变什么，以使某些情况变得可行。

让我集中讨论三个对我们大陆未来至关重要的问题。首先我关注“欧洲”的地理边界。委员会认为，欧洲的未来在于 27 国集团。然而，很明显，英国和其他许多国家已不属于 27 国集团。欧盟成员国的构成在未来 10 年内可能会进一步改变。在一个无论是美国还是新兴经济体都在崛起的世界，外部挑战必将增加。建立与欧洲大国英国和其他国家的联系是至关重要的。

第二个问题则涉及欧盟内部一体化的不同速度。推进一些国家之间的一体化使得欧盟凝聚力面临挑战，而这种担忧需要得到控制。例如，一项促进欧元区银行一体化的政策可能会降低银行业单一市场的完整性，从而在欧元区内外的国家之间形成一道楔子。这里的挑战将是避免一体化政策对那些不参与其中的国家产生敌对反应。在此情况下，政治上的善意可用来尽量减少摩擦。

第三个，也许是最重要的问题，涉及到欧元区本身的未来。在更深入和更长远的整合发生、包括财政风险分担的情况下，这很容易想象。然而，近年来，财政一体化进展缓慢，这绝非偶然。在欧洲北部的许多地区，鉴于不同国家之间的生产力差异和社会模式的差异，对于一体化是否正确存在着严重的怀疑。

任何货币联盟的核心问题都是中央货币、中央财政与国家财政政策的关系。作为一些具有不同历史和不同利益的多元化国家，欧元区最现实的选择是通过可信的条款来增加国家财政责任。这意味着更少的侵入性的财政监督，也意味着更明确的、必要时由市场强加的预算约束。

为使该方案成功，需要实现银行业的联盟和更多的资本市场的整合。欧元区的一些投资和社会基金将进一步提高信誉度。但即使是这种情况，也需要耗费大量的政治资本。既得利益引发的矛盾必须被解决，克服这些限制将是至关重要的。欧洲南部的生产率增长越快，就越容易建立额外的财政风险分担工具。无论从经济和政治的角度来看，这种情况都为加强欧盟和欧元提供了最大的可能性。

本文原题为“[What future for Europe?](#)”。本文作者 Guntram B. Wolff 为 Bruegel 研究员，本文于 2017 年 3 月刊于 Bruegel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特朗普的预算削减案是公平且必要的

Chris Edwards /文 杨茜/编译

导读：特朗普近期发布了第一个预算，旨在削减 540 亿美元的非国防项目，减少了包括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援助、交通运输补贴、能源补贴以及对文化组织的补贴。特朗普的预算削减是公平且必须的。削减计划将在国会上受到双方政党的激烈讨论。编译如下：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本周发布第一个预算，提出削减一系列的机构和程序。他宣布，在我们的预算蓝图中要削减 540 亿美元的非国防项目。“我们将会以更少的资源达成更高的目标，并且削减政府开支、对人民负责”。

特朗普的支持者在国会上不被青睐。另外，540 亿非国防开支的削减意味着 540 亿国防开支的增加。所以，五角大楼并未真正实现“削减”政策的核心，此项政策也不会减少支出，以使不断扩大的赤字得到控制。

更重要的是，双方政党都为国家的补贴方案辩护。不过，特朗普的建议反映了他在预算谈判中的强大起点。由于他广泛消除了民众的痛苦，他的削减计划被共和党选民认为是公平的。对于财政保守派来说，这确实是个好消息。

这项政策针对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援助，例如终止社区发展区补助金和经济发展管理部门，这些都为当地的商业活动提供补贴。它会削减许多无效的 K-12 课程。它还将削减各种家庭援助计划，例如为低收入家庭提供家庭能源援助和护理援助。

自由党和游说团体会抱怨说那些是关键的计划。但如果他们这样做，就意味着州政府要自己参与并资助这些项目。毕竟，联邦援助的资金最终来自生活在 50 个州的纳税人。

事实上，各州为自己的本地项目（如学校和扶贫项目）提供资金更为有效，这样做可以消除昂贵的联邦中间人。通过终止许多联邦援助计划，使各州免受与各种援助计划相关的联邦法规束缚。

特朗普的预算计划还包括削减交通运输开支。这意味着基本航空服务计划的终结。根据最近 CBS 的新闻报道，这些计划用于补贴使用于乘客稀少的航班，目的地往往通向很少使用的机场。它还将削减对美国国家铁路客运公司的长途火车补贴。这些削减措施将使得空中交通管制系统私有化。

这些改革的共同点是运输资金将从纳税人转移到服务用户。因此，预算将削减美国国家铁路客运公司补贴最多的路线，以提高整体系统的自给自足。至于向被认为“服务不足”的社区提供空中交通服务的基本航空服务计划，如果企业和地方政府认为这一计划很“重要”，则应该自己为航班付费。

这些改革的共同点是运输资金将从纳税人转移到服务部门。因此，预算将削减美国铁路公司大多数航班的补贴来改善整体系统的自给自足。至于向被认为“服务不足”的社区提供空中交通服务的基本航空服务计划，如果企业和地方政府认为这些航班很重要，则应该自己付费。

特朗普关于空中交通管制提案是以加拿大的成功改革为蓝本的。这个想法是将航空系统转移成一个由航空公司收费资助的非营利组织。加拿大使用这一结构后，其空中交通管制体系在效率和创新上均取得领先。而美国目前的官僚式航空体系却受到管理不善和航班延误的困扰。

特朗普的预算将削减能源、职业培训和向乡村企业发放的补贴。它还将削减对文化组织的补贴，包括国家艺术基金会，国家人文基金会和公共广播公司。这些都应由个人，企业和慈善机构私下资助。

特朗普的预算计划没有削减包括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在内的大型福利项目。这些福利项目是对国家财政健康的最大威胁，它们迟早会被削减。然而，特朗普的预算计划是对上一位共和党总统预算政策的改善。乔治·布什对国防、教育、卫生保健等没有足够补偿的项目进行大力补贴。这些补贴政策终结了比尔·克林顿总统时期的预算盈余，使美国走上了无休止的赤字和债务道路。

目前，特朗普提出的削减计划将引发关于联邦预算优先事项的讨论。联邦政府应该补助什么州，什么地方和哪些私人活动？五角大楼应该免除特朗普要求其他机构的“精益和负责”的做法吗？

特朗普的预算还提出了一个有趣的政治问题：对赤字表示关切的国会共和党人是否支持总统采取削减支出的方式来抵消开支的增加？

本文原题为“Trump’s Budget Cuts Are Fair and Necessary”。本文作者 Chris Edwards 是 CATO 税务政策研究所的主任。本文于 2017 年 3 月刊于 CATO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人民币国际化：中美治国方略的竞赛（聚焦中国）

Benjamin J Cohen /文 申劭婧/编译

导读：目前，人民币对美元的威胁是清楚无疑的。中国决心在最大可能上推动其货币的全球化，尽管在政策主动性上中国完成较好，但目前对市场行为的实质性影响还很有限，主要因为北京并未采取行动，这反映了其尚处于发展阶段的金融体系和美元在全球市场上持续的独一性。然而如果美国政策仍像过去一样自满，一切都会改变。特朗普政府越推进其重商主义计划，美元越有可能在将来被人民币取代。编译如下：

近一个世纪以来，美元一直在国际货币中占主导地位。对于全球经济来说这无疑是一件好事，因为全球通用的货币加快了跨境贸易，并且对金融市场的运行也起了关键作用。全球化进程也使货币发行者受益良多：美国因为美元的广泛使用而获得了可观的经济利益，包括交易成本的降低和更低的利率。同样重要的是，美元的盛行使其成为国际实力的重要工具，使美国可以在全球施加影响。

如今，美元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考验。一个新兴力量正慢慢浮现，即人民币。许多人相信，中国的货币注定在一段时间后会取代美元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但是，在关键领域，人民币面临的挑战是前所未有的。因为它和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是强劲对手，而这场竞争也将成为一个重要历史性转变的一部分。中国正筹划将自己变成世界主导力量之一。人民币的国际化就是这一野心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其地缘政治战略的一部分，中国明显将其货币全球化作为一个重要战略目标，非常欢迎并积极推动人民币在全球范围内发挥更重大的作用。

一种国际货币的竞争力依赖于两个因素。第一个是发行国的财力和潜在的“实力资源”，包括其经济的规模和复杂度，与全球经济联系的紧密程度，金融市场的流动性、深度和适应力以及外交和军事资产。第二个是发行国将实力转化成有效行动的能力，也就是其治国的能力，这篇文章就主要关注于第二个方面。

目前，中国对于人民币全球化的追求沿着两条路行进，一个是关注人民币在对外贸易中的使用，另一个关注全球金融中货币的价值储藏作用。与此同时，美国目前在进行有组织的美元优势地位保卫行动上并没显示出太大的兴趣。美国的货币治国很大程度上是被动的，将主动权交给了中国。这一做法的主要原因似乎是因为几十年来美国的货币主导地位使其过于自满，以为一切都理所应当，唾手可得。

通过对市场的供应方的政策有效性判断，中国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道路上已经成效显著。政府成功地在贸易和金融两个领域极大提高了人民币的吸引力和可获得性。然而，在考虑治国战略时这并非最佳方法。一个更好的指标是在什么程度上一种货币被使用。事实上，人民币在国际使用的各个方面仍然远落后于美

元。中国富有技巧的采取了一些并不强硬的行动，但是被其财力和市场渗透上的严重不足而阻碍。

积极来看，中国无疑具有鼓励更多使用人民币的经济规模，尤其是贸易方面。它的另一个优势是北京通过战略投资，双边援助协议和各类货币交换协定所获得的越来越多的国外政策联系网络。然而另一方面，北京的潜在地位却越来越差。最突出的问题是与其他推动货币全球化国家的民主政体不一样的专制政治制度。此外，许多人对中国庞大的军事储备表现出担忧。众多问题中，最突出的是中国金融领域的待发展状态，及其和其他地方资本市场的隔绝。它的股票和债券市场仍然不能提供投资者和央行们看重的深度，广度和适应性。流动性很低，资产价格波动较大，高质量的债券总量也较少。除此之外，在岸金融部门与资本控制的离岸市场仍然隔绝，投资资本想要进出国内市场只能依靠官方银行机构，并获得有关部门的批准。因此，人民币仍然是一种不能自由兑换的货币。以上综合，导致人民币在通向国际货币的路上停滞不前。

长期来看，人民币可能会成为美元的重要对手。而讽刺的是，如果达成这一后果，将更可能是因为美国的失败，而非中国治国的有效。截至目前，华盛顿对此的反应都是近乎冷漠的。在金融政策上，这意味着坐视不管，任由市场参与者和外国政府决定美元的命运。在人民币的挑战面前，美国为保护美元的优势地位所做甚少。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也并未像 20 世纪 60、70 年代英国政府那样考虑一个有组织后退路线。实际上，除了对中国的货币治国给予激进措辞，美国政策还相当中立的。随着特朗普新当选美国总统，这种政策失败的可能性已经在增加。因为美国如果采用不明智的经济，财政和贸易政策（例如贸易保护主义），将推动投资者和众多央行慢慢舍弃美元作为交易货币。

本文原题为“Renminbi Internationalization: A Conflict of Statecrafts”。本文作者 Benjamin J Cohen 为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的国际政治经济教授。本文于 2017 年 3 月刊于 CHATHAM HOUSE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中国不平等程度的逆转（聚焦中国）

Ravi Kanbur, Yue Wang, Xiaobo Zhang / 文 史明睿 / 编译

导读:自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日益严重的收入不平等现象就一直伴随着中国的发展。然而,许多研究显示,过去十年,中国收入不平等现象正渐趋稳定。本文运用住户调查、区域级政府统计数据等多个数据集,探索 21 世纪初期不平等现象的变化及其缓解的原因。城市化、转移支付和监管制度变化以及收缩的农村劳动力市场是收入不平等现象缓解的原因。编译如下:

中国经济的飞速增长和贫困人口的大幅降低一直是学者们研究的重点。除此之外,自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收入差距的演变也一直受到分析师和政策制定者们的广泛关注。日益严重的收入不平等现象成为伴随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部分评论家认为,这种现象是高增长率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还有一部分评论家则专注于这些日益扩大的差距带来的社会影响。

然而,随着数据的不断积累,当研究者专注于 21 世纪初期中国收入不平等变化过程时,一些研究者认为,2005 年以来,收入不平等现象正在缓解,收入不平等现象不再加深,甚至出现下降的趋势(Khan and Riskin 早期研究 2005)。

我们最近的研究试图全面评估各种数据,深入了解不平等变化的模式,对现有趋势进行初步解释(Kanbur 等, 2017)。我们的基本结论是,自 2000 年的第一个十年后期开始,中国的收入不平等现象发生了转变,并且这种现象源于中国政策变化以及经济结构转型。

我们的评估使用 1995 年、2002 年和 2007 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以及 2010 年、2012 年和 2014 年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数据¹。为使用这些数据,必须先解决完整性和可比性方面的问题,但数据中提供了 20 年(1995—2014 年)中国收入分配变化的分析。同时,使用国家统计局和省级年鉴的省级收入和人口数据分析了区域不平等问题补充了家庭层面的数据分析。Kanbur 等人(2017)提供了数据来源和调整的全部细节。

表 1 为 1995 年至 2014 年的基尼系数。我们可以看到,基尼系数变化呈倒 U 型,2010 年达到最高点 0.533。其他关于收入不平等的数据也存在类似的趋势(Kanbur 等人, 2017)。图 1 显示,前 10% 收入人群的收入占社会总收入的份

¹ CHIP 数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北京师范大学收集,CFPS 数据由北京大学收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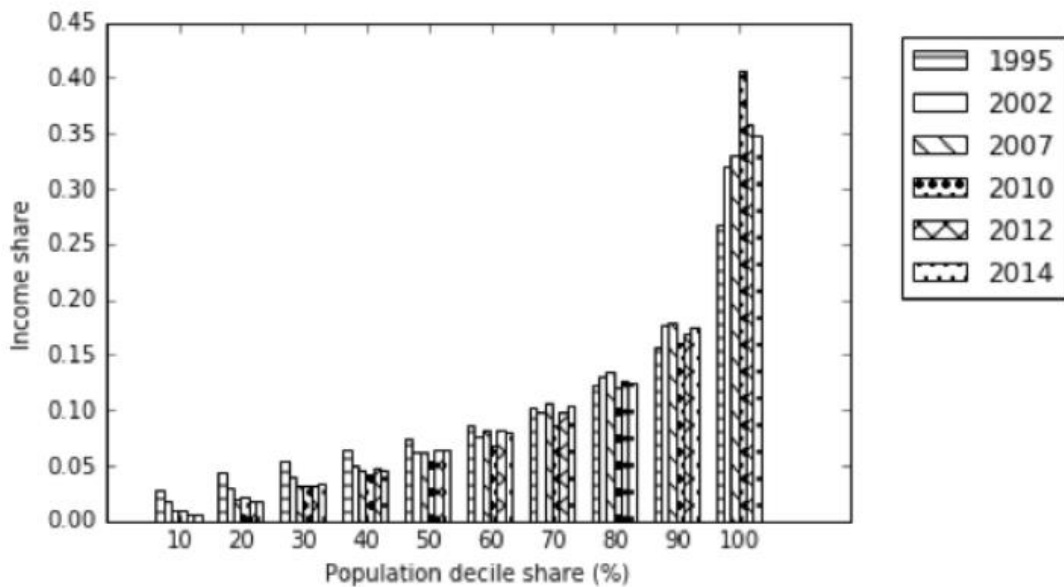
额在 2010 年到达最高点，为 0.4 左右，随后开始下降²。十等分收入群体中最高和最低组收入差距从 1995 年至 2012 年逐年扩大，2012 年后差距开始缩小。

表 1：家庭调查数据中的收入不平等情况度量

Year	Data	Gini
1995	CHIP	0.349
2002	CHIP	0.445
2007	CHIP	0.478
2010	CFPS	0.533
2012	CFPS	0.504
2014	CFPS	0.495

注：我们通过排除 CFPS 中不包含的组成部分来调整 CHIP 的收入数据。CHIP 2007 使用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数据。Kanpur 等人（2017）提供全部调整细节。

图 1：十等分收入份额（调整后收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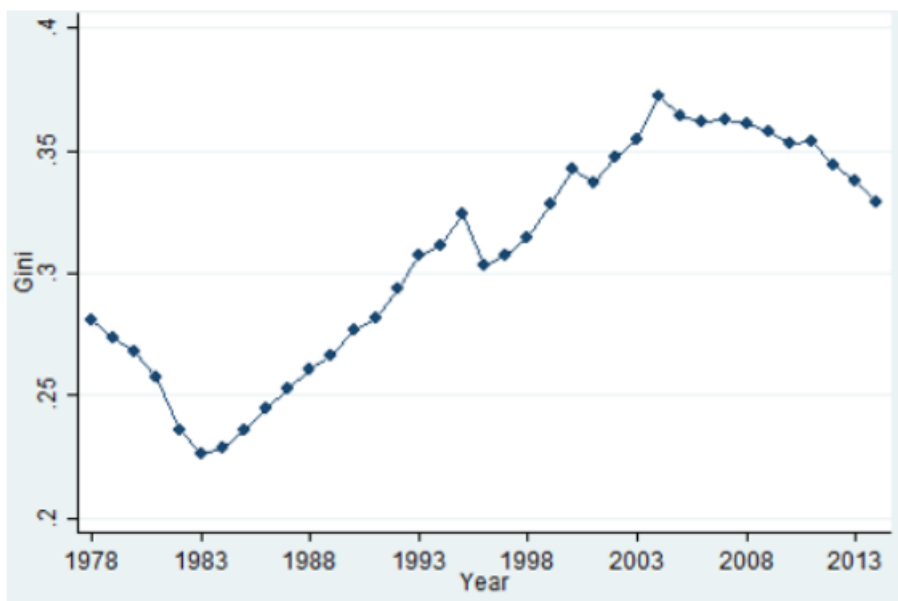


² Alvarado 等人(2017) 也发现高收入人群收入占社会总收入份额下降

组合 CHIP 和 CFPS 数据中的家庭调查数据，提取 1995 年至 2014 年期间六次同期统计结果。Kanbur（1999）和 Zhang（2005）引入了一种可用于追踪长期趋势的替代方法。该方法运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各省农村和城市人均消费数据。将其与每省的城乡人口数据相结合，构建农村地区和城市地区的国家消费分布图。显然，这将低估不平等程度，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收入不平等想象的趋势会逐渐显现。

图 2 表示了区域消费不平等现象的基尼系数。1978 年以后，不平等情况稍微缓解，1985 年以后开始逐渐凸显。这幅图显示不平等现象在 2005 年前后达到顶峰，随后下降。当然，图 1 和表 1 中基尼系数的值不可比，因为它们来自不同的数据源并使用了不同的统计方法。然而，两种数据中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的变化趋势是相似的，即 2005 年前后的不平等现象的变化趋势出现了逆转。

图 2：基于区域数据的人均消费不平等情况



是什么引发了逆转？就此问题，我们假设原因在于社会中心由农村及农业社会向城市及工业经济的转型。在这个框架下，国民收入分配可以视为农村和城市收入分配情况的加权总和。因此，国家不平等的趋势取决于三个因素：

- 农村和城市的收入差距
- 农村和城市的收入分配不平等

• 城镇化比率

张等（2011）认为中国现在已经达到了“刘易斯拐点”，农村到城市的大量移民缓解了城乡收入差距。此外，二十年代以来，政府对农村和落后地区的大量基础设施投资，提高了这些地区的经济活动收入（Fan 等人，2011）。

某些缩小城乡差距的政策措施可以进一步缓解收入不平等现象。例如，2004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颁布了《最低工资条例》，在接下来的十年，提高最低工资标准（Kanbur 等，2016）。此外，从2000年开始，政府增加并改进了一些社会计划。2004年以来，中国推出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目前已覆盖了全国95%以上的农村人口。2009年以来，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也陆续实施。尽管农村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保费仍远远低于城市，这些政策已经缓解了农村居民的看病和养老压力。

结论

由上可知，转移支付和监管制度变化、农村劳动力市场萎缩，减轻了中国的不平等现象。证据见表2和表3，表中显示了各种收入来源占总收入的份额和每个收入来源的基尼系数。因工资收入和转移支付收入是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所以，这两种收入的不平等现象急剧下降是总体收入不平等现象转折的重要原因。详见 Kanbur 等人（2017）

表 2：各收入来源占比

Year	Wage Income	Operational Income	Property Income	Transfer Income	Other Income
1995	0.503	0.392	0.008	0.068	0.030
2002	0.581	0.242	0.005	0.122	0.051
2007	0.639	0.137	0.032	0.172	0.020
2010	0.680	0.142	0.022	0.111	0.045
2012	0.693	0.106	0.031	0.132	0.038
2014	0.710	0.086	0.025	0.153	0.025

资料来源：Kanbur 等人(2017)

表 3: 各收入来源的基尼系数

Year	Wage Income	Operational Income	Property Income	Transfer Income	Other Income
1995	0.675	0.568	0.965	1.192	0.813
2002	0.659	0.632	0.992	0.900	0.885
2007	0.619	0.815	0.979	0.834	1.128
2010	0.602	0.784	0.981	0.916	0.914
2012	0.609	0.798	0.969	0.886	0.950
2014	0.583	0.834	0.960	0.853	0.963

资料来源: Kanbur 等人(2017)

最后, 当城市人口不断上升至一定程度, 不平等现象将开始减弱。Kanbur 和 Zhuang (2013) 认为, 不同于印度等其他发展中国家,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已经高于这一特定程度。

综上所述, 在中国, 改革开放后急剧显著的不平等现象已被一些因素的聚集而遏制。中国的不平等现象仍然很突出, 基尼系数在 0.5 左右, 但不平等上升趋势已经平稳, 甚至开始下滑。中国的不平等现象出现了很大的转机, 我们现在需要更好地了解中国的不平等现象, 并从中吸取教训。

参考文献

- Alvaredo, F, L Chancel, T Piketty, E Saez and G Zucman (2017) "Global inequality dynamics: New findings from WID.world", NBER Working paper 23119.
- Fan, S, R Kanbur and X Zhang (2011) "China's regional disparities: Experience and policy", *Review of Development Finance*, (1): 47–56.
- Kanbur, R, Y Li and C Lin (2016) "Minimum wage competition between local governments in China", processed, Cornell University.
- Kanbur, R, L Wang and X Zhang (2017) "The great Chinese inequality turnaround", CEPR Discussion Paper No. 11892.

Kanbur, R and X Zhang (1999) "Which regional inequality? The evolution of rural-urban and inland-coastal inequality in China, 1983-1995",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7: 686-701.

Kanbur, R and X Zhang (2005) "Fifty years of regional inequality in China: A journey through central planning, reform, and openness ", *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9(1): 87–106.

Kanbur, R and J Zhuang (2013) "Urbanization and inequality in Asia", *Asian Development Review*, 30(1): 131–147.

Khan, A R and C Riskin (2005) "China's household income and its distribution, 1995 and 2002", *The China Quarterly*, 182: 356-384.

Zhang, X, J Yang and S Wang (2011) "China has reached the Lewis turning point", *China Economic Review*, 22(4): 542-554

本文原题为“The great Chinese inequality turnaround”。本文作者 Ravi Kanbur, Yue Wang, Xiaobo Zhang。Ravi Kanbur 为应用经济与国际管理教授，康奈尔大学经济学教授，CEPR 研究员。本文于 2017 年 3 月刊于 VOX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亚洲之行：马蒂斯的使命

Scott Warren Harold/文 章珏/编译

导读：本周，美国新任国防部长马蒂斯将访问日韩两国，这是其任内的首次海外访问。文章认为，马蒂斯此行主要有三个使命：第一是加强与日韩两国领导和防长的个人交流，第二是让日韩两国承担更多的自身防卫义务，第三是强调东北亚各项问题上美日韩开展双边和三边合作的重要性。而其向盟友传递的核心信息就是“美国仍与你同在，但美国希望你做的更多”。编译如下：

本周，新任美防长马蒂斯将访问日韩两国，以安抚盟国的紧张情绪，这是其任内的首次海外访问。在竞选期间就宣称要求盟友承担更多防卫经费，并在就任首周就宣布退出 TPP，特朗普的上台确实使美国的一众亲密盟友和伙伴感到不安。而马蒂斯此行也将传达一系列特朗普此前一直在传递的信息，即美国仍与你同在，但美国希望你做的更多。

马蒂斯此行的第一个目标将是开拓并加深与日本首相安倍和防长稻田朋美的个人交流。他可以继承奥巴马任内开辟的各项友好合作，并在军事领域开辟新的合作方式。

安倍政府也盼望马蒂斯能重申双方同盟关系，特别是承认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适用于钓鱼岛问题。但马蒂斯可能利用此行来敦促安倍政府不要停止冲绳新基地的建设。

在会见韩国代总统黄教安和防长韩民求时，马蒂斯传递的将是相似的信息，那就是美坚定支持美韩同盟关系。对于韩国来说，目前国内的政治动荡尚未结束，国外朝鲜不断进行核试验，此时美国重申两者盟友关系将是有利的。此外，马蒂斯还可能鼓舞韩国尽快在半岛部署萨德。

与两国的首脑和防长会面将利于马蒂斯解释特朗普政府正在追求的亚太安全战略目标。面对中国和朝鲜，特朗普政府似乎将诉诸一种更强硬的姿态，但却尚未明确各盟友该扮演何等角色。马蒂斯也可能声明关于第三次“抵消战略”的情况，同时提示美将在该地区扩展导弹防御力量，而这些领域都是日韩盟国可以参与合作，共同研发的。

马蒂斯此行的第二个目标是寻找合适的方式，让日韩两国承担更多的自身防卫义务。美国不会离开亚太，但是它已无法独自面对崛起的中国和核挑衅的朝鲜所带来的挑战。近几年，日本在加强自身防卫上做了很多努力，但是在自卫军和日美军队互助上可以做的更多。韩国在发展对朝互相摧毁力量方面取得了很大进

步，但是它可以在相关领域做的更多，包括军事指挥、控制、计算机、导弹防御等。韩国还可以增强自身反潜能力和炮火实力等。

而发展上述实力将要求日韩两国投入更多的资金。马蒂斯可能声明，如果两国在自身安全上能投入更多力量，那美国将不会要求两国在驻地美军方面承担更高的费用。

马蒂斯此行的第三个目标将是强调在东北亚各项事务上开展双边或三边合作的重要性。马蒂斯可以鼓励日韩在下述领域继续迈出积极合作的步伐，包括慰安妇问题、军事情报交流和三边弹道导弹防御演习等。

在众多合作领域中，最应该被尽快讨论的就是关于半岛危机发生后，平民安全疏散操作将如何进行，三边该扮演怎样角色，以及建立何种沟通渠道。虽然美韩两国和日本自己已经在该问题上做了相关准备，但是日韩两国尚未就该问题进行面对面的交谈，以最终确定相关假定和提前采取行动举措。鉴于该问题的政治敏感性，只有在和谐的双边会谈中提出该问题才合理，然而目前朝鲜持续挑衅，开展相关讨论的紧迫性也在不断提升。

新政府之初将是重置过去假定，探寻处理地区外交和安全问题挑战的长久方法的阶段。马蒂斯上台后能如此早就访问日韩两国是极好的。如果他能重申新政府对于日韩两盟友的全力支持，同时明确美国政府的期望，那么在安抚对新政府持有不确定态度的亚太盟友的道路上就能走很远。

本文原题为“Mattis' Mission in Asia”。本文作者为兰德公司亚太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政治科学家 Scott W. Harold。本文刊于 2017 年 2 月 6 日 RAND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日本外交政策的主导方向：继续与美国保持积极稳定的关系

John Nilsson-Wright/文 刘立群/编译

导读：随着1月20日的到来，特朗普将真正入主白宫成为美国的执政者。日本安倍政府也在不断调整其外交政策，积极争取特朗普执政后与其进行后续会谈。2017年1月17日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Chatham House）网站发表文章《日本外交政策的主导方向：继续与美国保持积极稳定的关系》。作者主要从美日两国在亚太地区的东海、南海领域合作的利益，美国对韩日两国发展核武器以及日本对核武器发展的观点，TPP被废止后日本的新选择以及未来日本在美国和亚洲地区合作中的角色等三方面进行了叙述。编译如下：

11月份，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唐纳德·特朗普的会晤为日本与美国新政府建立关系而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同时与特朗普政府关键人物（最明显的是新的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弗林）的初步接触可以促使东京人们相信，两国不可能签署双边共同分担国防防御负担的协议。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可以从初始的迹象中得到一些保证：前布什政府在亚洲地区安置的一些关键性国家，在今后将有可能担当更重要的位置；美国对中国实行更强硬的安全政策，这可能成为东京和华盛顿加强协调合作的机会。

需要注意的一个关键问题是，特朗普是否需要一份日本对其带有实质性的承诺，即加强美国在南中国海的安全。同时，安倍晋三将寻求美国早期支持其在东海的战略利益，以及对钓鱼岛防御的声张。对此作为回报，日本可以向美国提供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终端高空地区防御（THAAD）导弹系统的承诺，这与美国在韩国最近达成的协议类似，从而有利于帮助防范来自朝鲜的核威慑。

首先，特朗普不可能兑现他竞选总统时提出的，可以推动首尔和东京发展自己的核武器的提议。其次，即使特朗普同意他们发展各自的核武器，日本对核也存在根深蒂固的反感（由于广岛和长崎的核爆炸）。因此任何日本领导人都不太可能去考虑同意发展核武器，甚至在面对事实上的核朝鲜或者韩国的时候，公众舆论更倾向于接受韩国有核武器。

在短期内，日本经济前景将受到特朗普政府承诺放松管制、减税和增加基础设施支出的预期的鼓舞，这可以让日本在美元相对利率上升日元贬值的情况下，使得日本公司获得新的出口机会。

这种新的乐观情绪，反映在对日本经济增长率约百分之一的预测中（根据经合组织），它部分抵消了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担忧，特别是因为这会影响在中国和

墨西哥的日本海外生产设施出口到美国市场的份额。随着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基本上被废除，安倍政府将关注 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等替代性区域贸易协定。安倍的这一系列政策，不仅涉及到他在 TPP 上投资的政治资本量，而且也寄希望于 TPP 可以抵消中国在东亚地缘政治影响方面的作用。

今年，安倍首次海外访问国家有菲律宾、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和越南。但是，安倍首相也奋力争取能在 1 月 20 日特朗普就职后与其进行后续会议。鉴于美国选民的孤立主义情绪很强烈，以及关注欧洲（尤其是脱欧后的英国）应对国内的一系列挑战。因此安倍政府的一些人认为，这样的新环境是提高日本作为国际秩序和法治倡导者作用的好机会，同时日本也会成为美国和亚洲其他主要合作伙伴之间联系的关键媒介。

本文原题为“Japan’ s foreign policy will now be dominated by the need to maintain positive relations with the US”。本文作者为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Chatham House）亚洲项目高级研究员 John Nilsson-Wright。本文刊于 2017 年 1 月 17 日 Chatham House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随着韩总统朴槿惠正式离职，韩国将会面对什么？

Scott A. Snyder / 文 刘立群 / 编译

导读：随着朴槿惠“闺蜜们”事件开始，韩国国会弹劾朴槿惠总统案件持续进行，在2017年3月10日朴槿惠弹劾案最终审判，通过总统弹劾决议。针对此弹劾案与韩国未来政局发展，对外关系委员会（CFR）官方网站在10日当天发表文章《随着韩总统朴槿惠的正式离职，韩国将会面对什么？》。作者在本文中主要介绍了韩国保守派和进步派之间的两级派系状况、有关新总统对外来外交政策发展方向和实现国内政治权力顺利过渡的相关内容分析。编译如下：

今天，韩国宪法法院一致支持国民议会弹劾朴槿惠案，为裁决后60天内举行新的总统选举铺平了道路。据报道，5月9日将是选举新总统的最可能的日子，新总统将代替朴槿惠的职位并任期五年。

朴槿惠宣称会立刻搬出青瓦台回到自己在江南的私人住所。随着她的离职，基本上可以肯定她会面临刑事审判，因为她不再享有免于起诉的豁免权。

韩国总统丑闻事件：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一决定，为早日解决已经席卷韩国数月的领导真空现象铺平了道路。韩国代总统黄教安以一个韩国政权的过渡角色出现，但是没有政治权力采取新的措施。一个被压缩规模和提早举行的新总统选举将是韩国回到国内政治常态的最快捷的方式，但是韩国政治常态的恢复依然只能遵循因弹劾裁决案引起的保守派和进步派之间分歧的极度两极分化现象而逐步进行。

两极派系现象

最值得注意的是，朴槿惠弹劾案已经对韩国保守派造成了损害，韩国保守派因为是否要弹劾朴槿惠而被削弱和分裂。保守派立法者支持国民议会弹劾朴槿惠议案，将处于执政地位的新国家党的权利委托给正义党。然而前朴槿惠党派的支持分子将新国家党改名为韩国新自由党，并且任命了一个临时党派进行领导。原本希望前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动员形成一个统一的候选人资格，但是他们团队在2月初就销声匿迹了。

随着公众对保守派支持的减弱，韩国公众对民主党派的支持率已经飙升到40%。而前民主党派领导人卢武铉和2012年民主党派总统候选人文在寅作为民主党派竞选总统的前锋人员，当时的支持率达到30-35%。民主党派的四人小组还包括韩国忠清南道知事安熙正和韩国京畿道城南市市长李在明，在最近的韩国

总统选举中，他们两位的支持率都突破了两位数。就目前对这三位总统候选人的支持率来看，民主党初选获胜者将极有可能赢得总统大选。

但是，随着公众的关注焦点从朴槿惠弹劾案转移到总统竞选，文在寅的候选人资格将面临严格的审查，尤其是那些先前的韩国保守派人士都不信任他的进步政治理念。因此，可能会影响此次竞选的主要问题是，是否存在一个总统候选人可以统一和动员韩国公众去中断文在寅的参选。

2012年，国民之党领袖安哲秀在选举中未能击败民主党领袖文在寅，但是他依然认为，如果可以获得保守党派的支持，自己可以成为总统候选人（尽管公众的支持率徘徊在8-10%）。没有可行的保守派的支持，安哲秀可能也会有机会成为文在寅的挑战者。

有关进步的韩国总统的问题

一位进步的韩国总统会提出一些关于该国外交政策未来发展方向的问题。尽管所有主要的总统候选人都强调要继续加强与美国保持牢固的联盟关系，进步者想要与朝鲜重开对话和建立经济关系，而且还希望通过促进区域合作来抵御上升的区域竞争，从而搭上中国崛起的顺风车。

随着国内政治恢复常态，他们将投入解决国民收入不平等和趋于严重的财阀特权问题。

韩国下一任总统面临的一个主要挑战就是，要设法实现有效的政权交接过渡。

艰难的权力过渡

由于这次选举的特殊情况，将意味着总统将在当选后的第二天就要宣誓就职。但是，他可能需要几周时间才能提名内阁，并在没有任何一方控制议会多数的国民议会举行听证会。因此，这位新总统最初将会领导这样一个政府，即不是由他选择的内阁人员或者代理部长担任临时领导，而选择新内阁。

虽然大多数行政机关在一到二个月的过渡期内完成组织自己的人员安排，但是韩国的下一任领导人必须在一天之内完成从零到六十天的组织安排。

然后，重建对国家领导层信任的艰难工作开始了。

本文原题为“Park Geun-hye’s Impeachment: What Next?”。本文作者为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韩国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美-韩政策项目研究主任 Scott A. Snyder。本文刊于2017年3月10日 CFR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本期智库介绍

The Center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CEPR) 经济政策研究中心

简介：经济政策研究中心成立于1983年。它包括七百多位研究人员，分布于28个国家的237家机构中（主要是欧洲高校）。其特点是提供政策相关的学术研究、并关注欧洲。Voxeu.org是CEPR的门户网站，受众为政府部门的经济学家、国际组织等。它的文章多为与政策相关的工作论文初稿，比财经报纸专栏更为深入，同时比专业学术文章更加易懂。

网址：<http://www.voxeu.org/>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Chatham House (Chatham House)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

简介：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成立于1920年，位于伦敦圣詹姆斯广场著名的查塔姆大厦内。是目前英国规模最大、世界最著名的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之一。其宗旨是“推动个人和组织对日益复杂多变的世界进行全面研究，并提供政策参考。”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与英国政府、企业、媒体和学术界均有着广泛的联系，对政府的外交政策有一定的影响。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Chatham House 在全球（含美国）30大智库中列第2名，全球30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6名，全球3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4名。

网址：www.chathamhouse.org/

Brussels European and Global Economic Laboratory (bruegel) 布鲁塞尔欧洲与全球经济实验室

简介：布鲁塞尔欧洲与全球经济实验室成立于2005年，是主要研究国际经济的独立、非理论（non-doctrinal）的智库。致力于通过开放、基于事实并且与政策有关的研究、分析和讨论，对欧洲及全球经济政策制定作出贡献。bruegel的成员包括欧盟各国政府以及一些领先的国际公司。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bruegel在全球（含美国）30大智库中列第16名，全球30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9名，全球3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3名。

网址：<http://www.bruegel.org/>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CFR) 外交关系协会

简介：成立于1921年，是美国非政府性的研究机构，致力于对国际事务和美国外交政策的研究。CFR是一个由精英学者组成的组织，成立伊始就成为20世纪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智囊机构，曾为威尔逊总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出谋划策。该协会主办的《外交事务》杂志曾刊登过乔治·凯南、基辛格和斯坦利·霍夫曼等美国知名外交家、国际政治学者的论文。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CFR在全球（含美国）30大智库中列第4名，全球3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6名。

网址：<http://www.cfr.org/>

RAND Corporation (RAND) 兰德公司

简介：兰德公司成立于1948年，是美国最重要的以军事为主的综合性战略研究机构。在其成立之初主要为美国军方提供调研和情报分析服务。其后，RAND逐步扩展，并为其它政府以及盈利性团体提供服务。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 中, RAND 在全球(含美国) 30 大智库中列第 6 名, 全球 30 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 8 名, 全球 30 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 13 名。

网址: <http://www.rand.org/>

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Innovation (CIGI) 国际治理创新中心

简介: CIGI 是关注全球治理的独立智库, 由 Jim Balsillie 成立于 2001 年。它的主要活动包括资助研究、创造交流网络、促进政策讨论、提高多边治理能力。具体而言, 它的研究集中于以下四个方面: 全球经济、环境与能源、全球发展、全球安全。它致力于将学术应用于政治, 通过优秀的研究与分析来影响政治决策。

网址: <http://www.cigionline.org/>

Peter G.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PIIE)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简介: 由伯格斯坦(C. Fred Bergsten) 成立于 1981 年, 是非牟利、无党派在美国智库。2006 年, 为了纪念其共同创始人彼得·乔治·彼得森(Peter G. Peterson), 更名为“彼得·乔治·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在《2011 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 中, PIIE 在全球(含美国) 30 大智库中列第 10 名, 全球 30 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 4 名, 全球 30 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 1 名。

网址: <http://www.iie.com/>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简介: IMF 于 1945 年 12 月 27 日成立, 为世界两大金融机构之一, 职责是监察货币汇率和各国贸易情况、提供技术和资金协助, 确保全球金融制度运作正常, 其总部设在华盛顿。IMF 主要通过监督、贷款以及技术援助和培训三大职能来促成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IMF 的工作论文及其他出版物在全球宏观经济政策研究方面拥有巨大影响。

网址: <http://www.imf.org/>

Cato Institute 加图研究所

简介: 加图研究所位于华盛顿特区, 成立于 1977 年, 是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大型智库之一。加图研究所以古典自由主义传统为思想根基, 致力于“扩展公共政策辩论维度”, 通过独立、超越党派的公共政策研究和讨论, 旨在“恢复小政府、个人自由、自由市场以及和平的美国传统”。加图研究所的政策分析曾经影响过里根政府和布什政府的政策。在《2011 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 中, 加图研究所在全球(含美国) 30 大智库中列第 14 名, 全球 30 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 3 名, 全球 30 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 8 名。

网址: <http://www.cato.org/>